



烽火 60年

社会发展与学术成长丛书

六十年

对外关系与国际问题研究

duiwai guanxi yu guoji wenti yanjiu

杨洁勉 等著

10

上海人民出版社



辉煌60年

社会发展与学术成长丛书



对外关系与国际问题研究

duiwai guanxi yu guoji wenti yanjiu

杨洁勉 等著

10

上海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对外关系与国际问题研究/杨洁勉等著. —上海: 上海
人民出版社, 2009

(辉煌 60 年·社会发展与学术成长丛书)

ISBN 978 - 7 - 208 - 09067 - 5

I. 对... II. 杨... III. 中外关系—国际关系史—研究—
1949~2009 IV. D82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234203 号

责任编辑 齐书深

封面设计 储 平

· 辉煌 60 年·社会发展与学术成长丛书 ·

对外关系与国际问题研究

杨洁勉 等著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c)

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发行

上海商务联西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720 × 1000 1/16 印张 16.25 插页 2 字数 271,000

2009 年 11 月第 1 版 2009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208 - 09067 - 5/D · 1676

定价 33.00 元

辉煌 60 年·社会发展与学术成长丛书

编 委 会

编委会主任：潘世伟

编委会成员（按姓氏笔画排列）：

王克梅	吕 贵	刘世军	芮明杰	杨 扬
杨洁勉	李明灿	吴 铎	何勤华	宋 超
张伟江	陈章亮	罗剑明	周鹤龄	郝德良
荣跃明	姜义华	袁恩桢	莫建备	晏可佳
桑玉成	彭希哲			

中国社会科学:学术理论与实践互动中的成长

(总序)

潘世伟

60年前天安门城楼上新中国成立的宣示响彻云霄,不仅是近现代的中国奋斗历程,同时也是数千年的中国历史就此开启了全新的发展阶段。人间沧桑辟新道,弹指挥间一甲子。在这波澜壮阔、凯歌行进的60年里,共和国的英雄儿女创立了举世瞩目的丰功伟绩。在制度创新方面,新中国完成了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成功过渡,逐步确立并不断完善了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制度,实现了中国历史上最深刻的社会变革,并在人类超越资本主义制度的探索中走在前列。在生产力发展方面,新中国先是在被包围遏制的状态下坚持自力更生,在极为落后的基础上建立起独立的国民经济体系,尔后又在改革开放条件下奋力追赶,使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三位。在人民生活方面,新中国致力于共同富裕的伟大实践,使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摆脱贫困、实现初步的小康,人民群众的生活质量显著改善。在对外关系方面,新中国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发展方针,永远结束了被侵略受压迫的屈辱历史,有效化解了复杂国际环境带来的种种压力,不断提升自己的国际地位,成长为世界经济政治格局中不容忽视的一支重要力量。所有这一切,不仅谱写了中华民族发展史上的壮丽篇章,也必将作为整个人类争取文明进步的光辉一页而载入世界史册。

如此伟大而深刻的变革实践,必将作用于精神观念层面。现代意义的中国人文社会科学艰难起始于20世纪交替之际的苦难岁月,其曲折发展始终依傍于中国社会的变迁。新中国成立60年来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除旧布新,为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提供了难得的机遇,打开了巨大的创造空间,积累了丰厚的经验素材,造就了初步繁荣的美好春天。

人们欣喜地看到,中国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学者积极投身于新中国60年的创造性实践,其间,跌宕起伏的曲折没有使他们委顿,剧烈急速的转型没有使他们迷失,内外重重的困难没有使他们消沉,接踵而来的成就也没有使他们陶醉。中国学者坚持与实践同行,与人民同在,与时代同进,充分发挥了认识世界、继承文明、创新理论、资政育人、服务社会的历史性作用。

在这60年中,中国学者的努力大致体现在这样一些方面。其一,深刻把握现实世情、国情。在新中国发展的每个时期,中国学者都十分注重认识外部国际环境,也非常注重分析国内现实状况,他们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特点和规律的准确判识,使理论创造和学术成长获得了坚实的基础。其二,努力推进主流理论构建。中国学者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两大成果即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开展了深入的学习、研究和宣传,有力地提高了执政党的理论水平,有力地促进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普及,也有力地增强了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的理论创新能力。其三,深入研究发展路径和模式。中国学者围绕社会主义改造、社会主义各项基本制度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主题,努力探寻经济政治文化落后国家以社会主义方式完成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信息化和国际化任务的具体路径和操作方案,并且力求在评估发展成果、总结发展经验的基础上逐步形成具有普适意义的发展模式。其四,竭力满足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亿万人民群众是新中国发展的主体力量,他们在创造历史的进程中也形成了物质生活改善和精神境界提升的强烈需求。中国学者为此开展了多种样式、多个层次的人文社会科学知识的传播工作,弘扬大众理性,创造共同精神家园。其五,坚持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本着古为今用的准则,中国学者梳理典籍、研究传统、传承民族文化的力度、广度和深度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从而使中华文化焕发出勃勃生机。其六,积极借鉴世界文明的优秀成果。中国学者始终保持着对世界发展潮流和各国文明优秀成果的敏锐感知,并以不懈的努力,介绍来自外部世界的前沿信息、最新知识,使这些有益要素融入中国,转化为帮助自身成长的新动力。

所有这一切表明,新中国成立60年来,学术与社会之间、理论与实践

之间、学者与人民之间形成了一种良好的互动。实践发展呼唤学术理论，学术理论推动实践发展，两者之间互为支持、互为促进。在此过程中，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的构建与发展加速而行。于是，人们看到，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得到确立，理论联系实际学风得到弘扬，门类齐全的学科体系得以形成，内容丰富的学术成果得以问世，生动活泼的学术风气得以倡导，新老结合的学术队伍得以扩大。概言之，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最好的时期。

在纪念新中国诞生 60 周年之际，上海学术界萌发了一个愿望。那就是从当代中国发展和当代中国学术成长的双重视角出发，回溯发展轨道，梳理成长脉络，总结变化规律，形成科学阐释。为此，我们组织上海各主要学术团体、各学科领域的专家学者，协同努力，以团队的力量分别探讨人文社会科学各主要学科与其依托的社会领域之间的互动关联，以及在此背景下的学术成长。通过这样的努力，以期重新再现新中国的伟大发展实践如何深刻影响学术成长，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如何始终保持与时俱进的新鲜活力，中国传统文化资源如何得到有效传承，世界人文学术优秀成果如何得到重视和引进，各类思想文化资源的集聚如何为人文社会各个学科发展提供丰厚养分。当然，由于丛书组织者和参与者的能力所限，我们未必能够达到这个预期的目标，丛书各卷存在的种种不足，希望广大读者给予指正。

最后，我们依然重申这样的信念，无论是新中国成立 60 年来的伟大实践，还是当代中国在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上的未来发展，都具有自身的独创性，决不是世界上其他发达国家现代化道路的简单复制，而是人类走向更高文明的重要路径之一。同样，立足于这一发展实践之上的中国人文社会科学，也将行进于一条不完全相同于其他发达国家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道路。目前，我们尚处于这条道路的起始端。更好地解读中国变革，反映中国发展，总结中国经验，研究中国模式，传播中国价值，形成中国风格，是一代又一代中国学者的历史使命，我们将为此不懈努力。

2009 年 9 月

目 录

C O N T E N T S

第一章 中国对外关系的历史性变化 / 1

第一节 指导思想和战略布局 / 2

第二节 中国对外关系的主要特点 / 17

第三节 未来的机遇、挑战和前景 / 27

第二章 国际格局与大国关系 / 34

第一节 战后世界格局演变及基本特征 / 34

第二节 从冷战敌手到合作竞争的中美关系 / 38

第三节 从意识形态联盟到睦邻友好的中苏/俄关系 / 60

第四节 从反霸同路到战略合作伙伴的中欧关系 / 72

第五节 从历史夙怨到战略互惠的中日关系 / 86

第三章 周边关系和睦邻友好 / 98

第一节 前 30 年中国周边原则与战略 / 99

第二节 改革开放与中国周边政策的演进 / 106

第三节 中国周边环境和周边关系现状 / 115

第四节 睦邻友好构建“和谐周边” / 121

第四章 中国与发展中国家对外关系的发展 / 129

第一节 中国与发展中国家外交关系的全面发展 / 129

第二节 从老朋友到新伙伴的政治关系 / 136

第三节 从单方援助到互利共赢的经济关系 / 156

第四节 从传统友好到交流互鉴的文化关系 / 167

第五章 国际体系和多边合作 / 174

第一节 中国参与多边合作的历史进程 / 174

第二节 中国的理念演变及认识变化 / 189

第三节 国际体系转型及中国参与多边合作的前景 / 200

第六章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 60 年 / 211

第一节 学科建设的艰难起步 / 211

第二节 当代理论的形成和发展 / 221

第三节 上海地区的现状与前景 / 233

后记 / 246

第一章

CHAPTER 1

中国对外关系的历史性变化

60年来,新中国在对外关系方面发生了历史性的深刻变化,其中最为显著的是新中国完全走出了自鸦片战争以来在世界上遭受列强欺侮压迫而成为国际社会中独立自主的重要成员,新中国和世界从政治互动为主到政治、经济、安全、军事、社会、文化等全面交往,从双边关系发展到双边、多边、区域和全球等多层次、全方位和宽领域共存,从在既有体系和秩序下的相互碰撞、磨合到共同构建新的体系和秩序。在60年的历史进程中,新中国外交思想和理念与时俱进,国际战略趋向完善,国家定位更为准确,实践不断丰富。新中国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友好睦邻、新安全观、和平发展、和谐世界和风雨同舟等价值观已经成为国际社会的公共产品。新中国的对外关系日益体现合作共赢的特点,展望从现在到建国百年的今后40年,中国必将对国际关系和全球事务作出与己相适应的贡献。

第一节 指导思想和战略布局

一、基本外交指导思想及其发展

（一）中国共产党三代领导集体创造性地将马克思主义和当代世界及中国实践相结合，形成和发展了各个时期的外交思想，指导着中国对外关系不断取得新的胜利，同时也为世界的和平发展作出了贡献

外交思想直接代表一国占主导地位的对外意图和该国的总体利益。^①而一国的外交思想主要是通过其主要领导核心来体现和表达的，是他们关于国家对外活动的想法、意见、观点的总和。^②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在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就产生过“纳赛尔主义”、“苏加诺主义”等外交思想，在欧美也有过“戴高乐主义”、“撒切尔主义”和“小布什主义”等。新中国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领袖都是杰出的战略家和外交家，从二战风云到全球化进程以及从中国革命胜利到改革开放的国际国内时势造就了中国各代领导集体以及他们的外交思想。毛泽东外交思想、邓小平外交思想、江泽民外交思想和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中央领导集体的外交思想等都是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是中国优秀传统思想在当代的再创造，是新中国丰富外交实践的理论总结和升华，同时也是中国汲取其他国家和人民优秀思想和成功实践的结果。从毛泽东外交思想到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中央领导集体的外交思想都是前后相继、一脉相承、与时俱进的科学体系，它们之间存在着内在的继承和发展的历史渊源关系。

新中国外交思想是中国对外关系不断向纵深发展的提升，是世界各国和人民相互关系实践的总结，是国际社会推进和平、发展、合作的集中体现。新中国的外

^① 门洪华：《中国外交哲学的演变》，《教学与研究》2005年第4期。

^② 参见叶自成：《新中国外交思想：从毛泽东到邓小平——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外交思想比较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页。

交思想是当代国际思想库中的瑰宝,是中国人民追求真理和实现理想的理论结晶,是广大被压迫民族和国家争取解放和继续发展的理论武器,是绝大多数国家和人民在全球化时代相互依存携手共进的理论探索。

在新中国中央领导集体的外交思想的指导下,中国外交始终以国家利益为出发点和根本归宿,以独立自主作为根本原则,始终把维护国家的独立和主权放在首位。新中国在 60 年的发展中,追求同世界各国发展平等、互利、共赢的相互关系,维护全球和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坚持国际关系的原则和准则,缓和与化解重大热点问题,并以负责和前瞻的精神推动国际体系和秩序的建设。进入 21 世纪后,中国在世界事务中的地位 and 作用进一步提升,中国的外交思想和对外关系已经成为影响世界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

(二) 毛泽东是新中国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周恩来则是他在内政外交方面的最重要副手。毛泽东外交思想集中反映了新中国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在处理对外关系时独立自主和捍卫国家利益的原则立场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反法西斯和民主精神推进了新中国的诞生,战后反帝、反殖和反压迫的潮流则是新中国不断取得世界认同的重要基础。新中国的成立结束了自鸦片战争后的百余年屈辱史,站起来的中国人民强烈要求维护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国家尊严和反对外来干涉。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的前夜庄严宣告:“中国必须独立,中国必须解放,中国的事情必须由中国人民自己作主张,自己来处理,不容许任何帝国主义国家再有一丝一毫的干涉。”^①毛泽东外交思想坚持从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维护国家的独立和主权,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和霸权主义,支持被压迫国家与被压迫民族争取和维护独立的斗争,坚决捍卫世界和平,真诚希望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与世界各国和在世界各国之间实现和平共处。毛泽东外交思想中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中美苏大三角战略关系”、“三个世界的理论”等对当时世界的外交思想产生过重大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西方对国际外交思想的话语权。

在新中国前 30 年的历程中,毛泽东外交思想指导着中国对外关系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新中国在成立之初克服内外困难,毅然决然地进行抗美援朝,使新生的共和国站稳了脚跟。此后,中国面对苏联的大国沙文主义,坚持独立自主,维护了

^① 《毛泽东选集》第 4 卷,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1465 页。

国家主权和尊严。中国又在错综复杂的国际环境中开拓对外关系,支持广大被压迫民族和人民的正义斗争,基本改善同周边国家的关系,逐步同主要发达国家建立正常关系,逐步淡化意识形态因素,开启务实外交,从而为以后中国外交思想的发展和外交实践的进步奠定了基础。

(三) 邓小平是第二代中央领导核心,邓小平外交思想的精髓是解放思想和实事求是,在新形势下进行改革开放,使中国的对外关系紧紧地为中国现代化建设服务

邓小平外交思想是邓小平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同时代特征和当代中国外交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是毛泽东外交思想在新形势下的继承和发展。^①邓小平外交思想内容丰富,洋溢着鲜明的时代气息和民族精神,是中国制定外交政策和指导外交实践的指南。^②

20世纪70年代末,邓小平在坚持毛泽东思想真谛的同时强调要解放思想和实事求是。邓小平指出:“解放思想,就是使思想和实际相符合,使主观和客观相符合,就是实事求是。”^③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进一步“运用辩证思维方法综观国际风云变幻,洞察内外形势发展,把握当今时代特征,继承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创立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外交思想。”^④邓小平外交思想的基本内容是: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坚持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为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作出自己的贡献。中国永远不称霸,始终和第三世界国家站在一起,为维护第三世界国家的权益而斗争。中国坚持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对于一切国际事务和国际问题都从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根据事情本身的是非曲直,独立自主地决定自己的立场和政策。邓小平外交思想准确地体现了国际形势发展变化和当今时代的本质,不但开创了中国外交的崭新局面,并为中国新时期确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和改革开放历史进程奠定了理论基础。^⑤

在邓小平外交思想的指引下,中国开启了改革开放的航程,调整了内外重大政

① 《江泽民主席在第九次使节会议上的重要讲话》,《当代世界》1998年第10期。

② 钱其琛:《深入学习邓小平外交思想,进一步做好新时期外交工作》,载《邓小平外交思想学习纲要》编写组:《邓小平外交思想学习纲要》,世界知识出版社2000年版,第7页。

③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64页。

④ 郑必坚等主编:《邓小平理论基本问题》,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2年版,第50页。

⑤ 杨成绪:《试论邓小平外交思想》,《国际问题研究》2004年第6期。

策,实现了中美建交和中苏关系正常化,争取到了有利的国际环境,并分别于1984年和1987年完成了关于香港和澳门回归祖国的谈判。20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国内发生政治风波,国际风云激变,西方国家联合向中国施加压力和实施“制裁”。邓小平综观全局,对形势突变及时作出了精辟的论断,提出“冷静观察、沉着应付、稳住阵脚、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等战略方针,指导着中国维护国家主权和尊严,深入推进改革开放,并因势利导地开创了外交工作的新局面。

邓小平外交思想也对国际上当时及以后的外交思想和国际关系产生了重大而又深远的影响。联合国前秘书长加利认为:“(邓小平)领导的中国改革开放,不仅对中国而且对国际社会来说都是尤为重要的。因为国际社会需要中国参与国际事务,没有中国的改革和对外开放,中国就不可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应有的重大作用。”^①邓小平外交思想和外交实践把中国推上国际舞台中心,以他的和平发展时代主题影响着东西南北的关系,而他本人也无可争辩地成为影响20世纪世界进程的少数几个伟人之一。

(四) 江泽民是中国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江泽民的外交思想产生于中国和国际形势发生历史性转变时期,指导了中国外交因应内外变化,打开了中国对外关系的崭新局面

江泽民是中国共产党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中国面临国际国内政治风波的严峻考验,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面临空前巨大的困难和压力。在这个决定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重大历史关头,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在对外关系方面,维护国家的独立、尊严、安全和稳定,坚持改革开放,捍卫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在江泽民主持中央工作的13年中,中国坚持“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方针,实现香港、澳门顺利回归,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打开了对外关系的崭新局面。

江泽民外交思想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组成部分,是在新的国际形势和历史条件下,对毛泽东和邓小平外交思想的继承、发展和创新。江泽民外交思想从中国和世界的历史、现状和未来着眼,准确把握时代特点,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为中国对外关系指明了前进方向。江泽民外交思想强调中国和世界的建设性互动,从理论和实践上把中国的对外关系推上了新的台阶。

^① 《丰碑——大型电影纪录片〈丰碑〉解说词(1)》,《光明日报》1998年2月13日。

江泽民外交思想的主要内容是:坚持和平发展时代主题,维护世界和平和倡导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把握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趋势,抓住和善用战略机遇期,倡导国际关系民主化和发展模式多样化,提出新安全观和构建合作安全新架构,反对各种形式的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和恐怖主义等。^①

在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运筹帷幄下,中国成功应对了“八九风波”和苏东剧变造成的严峻挑战,善用日益增长的综合国力,调整了同发达国家的关系,改善了周边关系,夯实了同发展中国家的关系,积极开展双边和多边外交,有效参与全球性组织,主动倡导区域和次区域组织,有力打击国际恐怖主义,提升了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影响,开创了在政治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时代中国对外关系的崭新局面。

在 20 世纪 80 年代末和 21 世纪初的国际环境中,西方沉浸在冷战“胜利”之中,认为世界在制度和思想之争方面已经处于“历史的终结”的时代,美国自诩实力无与伦比而认为世界进入了单极时代。正是在这一大背景下,江泽民外交思想从理论、战略和政策方面独树一帜,国际社会因而拥有了诸如国际关系民主化、发展模式多样化、多种文明共处等非西方的思想和选择,而中国综合国力的提升和国际地位的提高在实践中也打破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对国际关系发展方向的垄断权。

(五) 进入 21 世纪后,在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的领导下,中国外交思想有了新的发展,在对外关系方面坚持和平发展道路,推动构建和谐世界

中共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中央领导集体在继承和发展三代领导集体外交思想的基础上,坚持理论创新,先后提出推动建设和谐世界和构建国际新体系两大重要战略思想。从毛泽东的“和平共处”、邓小平的“和平与发展”、江泽民的“和而不同”到胡锦涛的“和谐世界”,新中国的和平外交思想既一脉相承,又不断发展创新。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中央领导集体正确认识时代潮流发展,在全球化趋势发展的背景下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高举和平、发展、合作的旗帜,并于 2005 年倡导推动和谐世界的建设。在和谐世界理念的大框架下,中国的国际体系观和国际合作观的思想得到了升华,中国外交思想的理念正在成为国际外交思想的公共产品,推动了全球的和平、发展、合作事业。2008 年夏秋之际,源于美国次贷危机的国际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先后爆发。中国领导集体沉着应对危机,善用新兴大国的群体力量,推动国际格局的多极化进程,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体系。在

^① 中共中央宣传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学习纲要》,学习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91—97 页。

国际体系和国际秩序方面,中国在思想、理念和原则等问题上也有了建设性的贡献。胡锦涛要求国际社会坚持全面性、均衡性、渐进性、实效性的原则,推动国际金融秩序不断朝公平、公正、包容、有序方向发展,并就改革国际金融体系提出了具体的建议。^①

二、外交理念的确立和发展

所谓外交理念,是指对国家外交的理性认识、理想追求和哲学信仰的抽象概括,它是国家外交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外交理念在过去 60 年中逐步发展,在时代观、体系观、利益观、和平观等方面形成了系统和完整的体系,具体指导着中国的对外关系。

(一) 60 年来,中国对所处时代的认识和判断逐步明晰和稳定,实现了从战争与革命时代向和平与发展时代的根本转变

时代观是人们认识和判断现实所处的历史方位、国际环境、发展阶段所得出的结论和看法,是一国确定外交战略的基本依据。影响建国之初毛泽东等中共第一代领导的时代观主要有三方面因素。一是国内长期艰苦的革命战争和革命斗争现实以及退居台湾但仍准备反攻大陆的国民党残余势力的威胁。二是复杂的国际环境,如 1950 年至 1953 年的朝鲜战争,50 至 70 年代的印度支那战争,以及战后风起云涌的民族独立和解放运动等。三是列宁关于战争和革命时代观的影响。因此,早在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就认为“现在的世界,是处于革命和战争的新时代”。在 20 世纪六七十年代,更是引申为“不是战争引起革命,就是革命制止战争”的论断。直到 1977 年召开的中共十一大,仍旧强调毛泽东的观点,即“只要帝国主义和社会帝国主义这个社会制度不改变,战争不可避免,不是相互之间的战争,就是人民起来革命,绝不会有持久和平。”^②在 20 世纪 50 至 70 年代,中国在战争和革命时代观的影响下,在“左”的思想干扰下,过分强调

^① 胡锦涛:《携手合作同舟共济——在二十国集团领导人第二次金融峰会上的讲话》(2009 年 4 月 2 日),《人民日报》2009 年 4 月 3 日。

^② 《华国锋在十一大上的报告》(1977 年 8 月 12 日报告,8 月 18 日通过)。

“革命”与“反霸”，过于重视意识形态，强调以苏（美）划线，限制了自己在国际舞台上的灵活性。尤其是在 20 世纪 60 年代中国“反帝反修”，采取“两面开弓”和“四面出击”的战略，一度处境被动。究其原因，一方面是险恶的生存环境和客观形势使然，另一方面则有对世界形势和国际趋势的某些误判，同时也有国内因素和主观意识的驱使。中国与世界的关系，也表现为时而突破、发展，时而紧张、恶化。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的时代观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依据对当时世界形势和国际局势变化的准确把握和冷静分析，邓小平明确指出世界大战在可预见的将来打不起来，和平与发展在很长时期内将是时代发展的主题。江泽民在 90 年代提出中国同西方垄断资本主义大国之间不存在“根本的利害冲突”。中国已不再以划分敌、我、友这种简单的方法来处理国家之间的关系，特别是处理大国之间的关系。进入 21 世纪以来，胡锦涛提出：“和平与发展仍然是时代主题，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已经成为不可阻挡的时代潮流。”^①

在和平发展时代观的指导下，中国开始调整国家发展战略，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中国外交就是要配合国家的经济建设并为此创造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这种时代观厘清了中国与世界的相互关系，并体现出了一种高度稳定性，即使在经历了“八九风波”、苏东剧变和伊拉克战争的严重冲击下，也丝毫没有动摇过。同时中国开始以积极的姿态深刻地参与到经济全球化进程当中，把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视为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和中国发展的新机遇和有利条件。

中国的时代观充分体现了中国外交判断的独特性、长期性和战略性。中国以和平发展为主题的时代观准确全面地揭示了国际社会在当今时代的发展规律和面临的历史任务。中国的时代观正日益为国际社会所认识、认可和认同。

（二）中国与国际体系的关系经历了从疏离到参与再到融合的艰难历程，实现了从国际体系的“受害者”、“革命者”，到国际体系的“参与者”和“建设者”角色的历史性转变，现行国际体系也因此而更具代表性和合法性，并注入改善、改造和革新的积极因素

中国与世界关系的核心问题，实质上就是中国与国际体系的相互关系，中国的迅速崛起也正在同国际体系改革交织相向。现代国际体系起源于威斯特伐利亚主

^① 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2007 年 10 月 15 日），《人民日报》2007 年 10 月 25 日。